

顾清扬

自2009年以来，中国一直保持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出口国地位。出口不仅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，也在稳定全球供应、抑制通货膨胀和提升消费者福利方面，发挥重要作用。

但今天，中国出口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。中国的出口模式，正从过去“为全球消费者生产商品”，逐步转向“为全球生产体系提供能力”。中国不再只是全球消费品供应者，而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“工业母机”——向世界输出设备、技术、零部件以及工业化能力。这一变化已在贸易结构中清晰显现。近年来，中国出口的工业中间品和资本品占比持续上升，消费品占比则相对下降。

中国是大国经济体，增长从来不是孤立实现的，而是建立在与世界经济的深度互动之上。在当前地缘政治剧烈震荡、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，中国如何重塑对外经济关系，不仅关乎自身发展，也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稳定。理解这一转变的关键，在于认清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，并据此调整对外经济关系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形成一种以制造业扩张为核心的发展模式：通过大规模投资，迅速建立生产能力，并以出口带动经济循环。在这一阶段，中国制造主要集中于中低端消费品。由于国内收入水平有限、消费不足，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。

中国向全球市场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消费品，在推动自身工业化的同时，也有效压低发达经济体

的通胀水平，提升全球消费者福利，形成一个典型的“双赢格局”。

然而，这一模式正面临越来越明显的结构性约束。

首先，中国经济体量和制造能力已发生质变。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大国，中国供给能力持续扩张，但全球对消费品的吸纳能力却相对有限。发达经济体消费增长放缓，发展中国家购买力不足，使消费品需求越来越难以匹配中国庞大的供给规模。

其次，外部环境显著变化。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，使传统出口导向模式受到限制，中国消费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。

再次，中国内需短期内难以完全承接供给。企业利润收缩抑制收入增长，就业压力上升，社会保障体系仍待完善，加之居民预期偏弱和消费倾向谨慎，使单纯依靠刺激消费难以消化过剩产能。

这意味着，以消费品生产与出口为核心的旧增长逻辑，正在接近极限。中国的出路，在于向资本品、工业设备和生产资料供给的战略性转型。

过去几十年，中国不仅实现规模扩张，更完成持续的产业升级。当前，中国已进入中高端制造阶段，科技能力显著提升，产业链体系高度完整，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。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，中国的比较优势正从

消费品转向资本品、装备制造和工业中间品。

这一变化在中国与亚细安的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2024年，中国与亚细安的贸易，工业中间品占比已接近60%，其余贸易大部分也主要由资本品构成，消费品所占比重已相对较小。中国已成为亚细安最大的零部件、工业组件和机械设备来源国。

这表明，中国与亚细安之间的经贸关系，正在从传统的商品贸易，转向更深层次的生产网络整合。这种变化正在改变亚细安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。亚细安不再只是中国商品的终端市场，而正在逐步转变为区域产业链中的制造平台。中国提供的工业中间品和生产设备，使亚细安国家能够降低工业化成本，吸引更多制造业投资，并逐步从简单组装走向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深化，正在为亚细安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动力。

随着中国供应链向区域延伸，亚细安企业有机会进入更高层次的区域价值链，增强本地制造能力，提高本地配套率，并提升整体竞争力。亚细安获得的，不只是商品，而是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机会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亚细安与中国并不是相互替代，而是在推动亚细安与中国一起实现工业化升级。这也是一种新的互利共赢。中国通过输出工业能力缓解国内产能压力，亚细安则通过融入区域供应链提升产业水平，双方共同受益。

与此同时，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加速工业化进程，对基础设施、生产设备和工业中间品的需求快速上升。相比发达国家，中国在成本、规模和产业配套方面具备明显优势，能够提供成体系的工业化解决方案——不仅输出产品，更输出生产能力。

换言之，许多发展中国家真正需要的，不是更多消费品，而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。

另一方面，发达经济体正在推动再工业化，但面临设备老化、成本高企等约束。中国具备性价比优势的装备制造和工业生产资料，可以与其既有优势形成互补，降低转型成本，为设备更新和再工业化提供支撑。

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绿色转型领域。当前全球能源紧张局势叠加人工智能带来的算力需求，使能源问题日益突出。中国在光伏、储能、电动化等领域具备规模与技术优势，有能力通过绿色设备出口，推动形成更加稳定、可持续的全球能源与产业体系。

因此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重构：从“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商品”，转向“为全球工业化提供能力”。这种新型关系有助于缓解传统消费品贸易摩擦，将国际合作重点从“商品竞争”转向“能力建设”，并为下一轮全球化提供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新路径。

最终，中国与世界之间形成的，可能不再只是商品流通的循环，而是产业能力与发展机会的循环。这或许正是未来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方向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
原载《商业时报》